

## 構建佛教中國化學術話語的力作

### ——聖凱教授《佛教觀念史與社會史方法論》評介

張重洲  
清華大學

如何構建“佛教中國化”的學術話語？這不僅是中國佛教界學術研究亟待解決的困境，更是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的重要理論支撐。聖凱教授最近出版的《佛教觀念史與社會史方法論》（宗教文化出版社，2022年10月），立足於“佛教整體”和“中國整體”，秉持“同情之默應”與“心性之體會”的嚴謹態度，依佛教觀念史與社會史方法探討佛教中國化，為構建研究佛教中國化的學術體系提供了一條可行的路徑。

陳寅恪曾提出學術的突破，必須有“新材料”的發現、“新問題”的提出、“新方法”的運用，三者結合才能真正得以實現。佛教作為一種世界性的宗教，在歷史脈絡裏具有高度的綿延性，史實與傳統觀念的形成，更是社會生活與觀念互動的產物。以往的佛教研究方法中，觀念史和社會史是兩個重要的研究方向，卻又是兩個完全獨立的領域與方法，社會史重在關注佛教的制度和方法，觀念史則聚焦於佛教的思想脈絡與概念變遷。面對真理信仰的主觀性與學術研究的客觀性要求之間存在的巨大鴻溝，如何整合兩個領域間的差異，

進而全面認識佛教中國化，成為了《佛教觀念史與社會史方法論》寫作的緣起。

## 一、觀念整合奠定了佛教中國化的理論基礎

“佛教中國化”不僅是以中國整體文化為背景的文明對話與交流互鑒，更是根植於本土的中國化佛教。全書開篇就提出要在“作為人類文明的佛教”視域下展開整體性佛教中國化的研究。作者批判二分對立的視角，強調歷史中多元主體的互動，認為應當從“佛教整體”的視野中理解個體信仰，要在精英與經典思想之外去尋找“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尋找人們真正用以解釋和理解世界的常識，並將之納入思想史的領域。

以佛教觀念史作為方法論去研究“佛教中國化”，無疑具有巨大的優勢。佛教觀念史的研究上達思想史、哲學史，下貫社會生活史。其研究的對象正是作為“文本”的經典世界與作為“歷史”的生活世界之間的互動，具有強烈的歷史和社會語境。因此，佛教觀念史本身既呈現出佛學亦宗教亦哲學的特質，又能夠借此梳理出佛學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作者也強調，佛教觀念史的研究必須首先源於佛教內部的觀念體系，然後才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進而開展現代學術的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的建構。

該書整合了佛教觀念史的三大要素和維度。三大要素佛、法、僧對應為觀念、制度、生活，並將教、理、行、果概括為經典、觀念、生活三大層面。前者是“教”的體系，後者是“法”的體系，二者共同構成了中國佛教理論體系的基礎。其中，經典作為文本是觀念的載體，制度和生活作為社會史是觀念的現實展開，呈現了佛教

觀念在時間上的歷時性與空間上的共時性，體現出了觀念與社會的互動。而作者所提出的佛教觀念史的三大維度，即代表了法與心的“真理維度”、解脫與生活的“神聖維度”、經典成立與組織存在的“歷史維度”。依此種路徑來看待和理解中國漢傳佛教，不但能夠解釋佛教內部的合流，亦能解釋中國思想的儒佛道三教合流。

## 二、研究轉向為佛教中國化提供了內在視野

傳統研究中國佛教與社會關係，均是沿著佛教與政治、經濟、慈善公益、社會生活等不同領域展開。基於此視野研究“佛教中國化”存在兩個基本困境，一是沒有清晰的主線，二是缺乏明確的問題導向。該書在觀念整合的基礎上，提出以“漢傳佛教”的形成與傳播作為解決問題的核心思路。“漢傳佛教”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土壤正是中國社會，佛教與中國社會之間存在著文化互動、互補、共生、合流。如何克服傳統弊病進而書寫真正地中國佛教，這也成為全書所要闡發的三個重點：

一是回到真實的歷史。全書的研究目的在於呈現佛教作為信仰者生活世界的情境、生命體驗與時代生活，通過對文本的解讀去還原歷史上的“生活”，揭示與發現宗教踐履展開的“行動”規律，發現生活世界背後的觀念，總結與詮釋佛教作為世界性宗教的普遍真理意義。作者以“共同生活”的視角開展研究，將其大致分為七大研究領域，即信仰生活、制度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物質生活、寺院經濟以及寺院生活空間。

二是回到以人為中心的歷史，彰顯“僧眾作為佛教的實踐主體”的能動性。對於“佛教徒”生活的研究，全書主張以“社會生活史”

作為方法，依據“文本—歷史—觀念—思想”的研究層次遞進展開。從“行動”的視角對歷史加以理解，具體落實到以人作為一個主體而存在、作為一個行動者而存在的視角去審視並書寫歷史，進而還原生活世界的具體情境。

三是回到內在的歷史，凸顯“佛教作為宗教”的本性。該書強調要將研究從“外部視野”轉向“內在視野”，關注漢傳佛教化世俗方式的轉變對漢傳佛教的塑造力。通過“觀念與社會互動”相結合、由外向內的視野轉變，共同探討佛教中國化的歷程，既克服了社會史研究碎片化的弊病，能夠最大程度地去還原史實，又能借助觀念整合與時代的觀念思潮形成本質上的關聯，客觀見證佛教從一個外來宗教演變為植根於中國文化土壤之上的佛教。

### 三、適應融合指明了佛教中國化的切實路徑

中國佛教的產生，是佛教同中國社會長期以來相互融合的產物。要堅持“佛教中國化”，進而構建中國佛教研究的學術話語，並沒有絕對的主臬和模式可依，但必須有符合中國實際的路徑。該書借助“觀念整合”“制度適應”“生活融合”來解釋了漢傳佛教的形成與傳播路徑——面對佛教進入中國並落地生根，正是中國佛教自身對佛教觀念體系主動整合的結果。這種整合經歷了繼承、闡釋、創新三步，即通過“繼承”理解佛教作為從域外文明的精髓，將其轉變為中國人接受、可分享的觀念體系與制度生活；通過“闡釋”佛教的深層結構與終極義理，發掘文明之間“相互理解”與“相互傾聽”的過程；通過“創新”重新構建全新的漢傳佛教觀念體系。漢傳佛教信仰如何形成獨特的主體性？作者提出佛教正是以中國社

會的現實關切為牽引，通過本土的文化表達方式進行自我詮釋，形成了一整套獨立的問題意識與話語系統。具體而言是完成了信仰價值追求的此世化、信仰對象的空間化、信仰表達方式的禮製化，三者共同實現了信仰價值與表達的“中國化”。制度適應為佛教找到了一條能夠將外來思想觀念體系，帶入並轉化為實踐和生活觀念體系的切實路徑，從而構成了中國佛教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中國社會接納佛教並與之進行融合，既包括形而上維度的信仰生活，又包括形而下維度的經濟、物質生活。該書以僧俗地位的尊卑之爭、“沙門致敬王者”的論爭案例突出了中國文化傳統與佛教間的衝突，又以“格戒”現象、“不事生產”到“不作不食”的轉變為例，表明了兩種文明之間的交流、融合與共生，譜寫了佛教中國化的演進歷程。

佛教方法論是構建“佛教中國化”學術話語體系的關鍵要素之一。《佛教觀念史與社會史方法論》一書以構建觀念史和社會史視域下的“佛教中國化”為核心。作者希望通過闡明其演變歷程，將中國佛教史還原到一個“全球視野、中國本位”的佛教學術體系和理論框架中。作為一本專門介紹佛教研究方法論的專著，此書是構建“佛教中國化”學術話語體系的積極嘗試，其出版與研究具有很強的開拓性意義，該書獨特的分類方法與研究視野，為後輩研究學人提供了新的指導。我們也應當看到，對中國佛教史方法論的研究本身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綜合性課題，不可能要求一本專著或單篇論文的研究面面俱到。但是，書中切入問題的角度、利用的研究方法、構建出的體系框架，無疑為佛教中國化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指明了新方向。